



农业经济问题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ISSN 1000-6389, CN 11-1323/F

《农业经济问题》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乡村走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多元组织机制及其制度逻辑——基于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研究
作者： 李卓，刘天军，郭占锋，霍学喜
DOI： 10.13246/j.cnki.iae.20230818.001
网络首发日期： 2023-08-21
引用格式： 李卓，刘天军，郭占锋，霍学喜. 乡村走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多元组织机制及其制度逻辑——基于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研究[J/OL]. 农业经济问题. <https://doi.org/10.13246/j.cnki.iae.20230818.00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乡村走向全面振兴过程中的多元组织机制及其制度逻辑*

——基于陕西省袁家村的经验研究

李卓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杨凌, 712100)

刘天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凌, 712100)

郭占锋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杨凌, 712100)

霍学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杨凌, 712100)

摘要: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协同推进, 以此为组织、动员和挖掘村庄发展资源提供制度保障。本文通过回顾袁家村从贫困村走向富裕村的变迁过程, 揭示政府、市场与社会在促进乡村走向振兴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 并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揭示其背后的行动逻辑。研究发现: (1) 政府机制在村庄集体工业阶段发挥着主导作用, 通过制度和政策发挥着支持与制衡的双重作用, 市场机制在传统农业阶段和集体工业阶段发挥着有限的资源配置作用, 而在乡村旅游阶段, 市场逐渐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而社会机制存在于袁家村发展的各个阶段, 持续发挥着催化与粘合作用, 与另外两种机制协同并进, 促进乡村走向全面振兴; (2) 在袁家村走向振兴的过程中, 由于不同阶段面临的发展困境、制度环境和发展情境不同, 导致其采取的发展逻辑有所差异, 政府逻辑、市场逻辑与社会逻辑分别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主导作用, 但无论哪种逻辑发挥主导作用, 都需要与其他两种发展逻辑实现动态匹配。

关键词:乡村振兴; 政府、市场与社会; 协同推进; 农村改革; 内在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当下中国乡村的具体实践, 其总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王露璐, 2021)。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已逐渐成为新时代“三农”工作重心转移的标志和总抓手(韩俊, 2018; 姜长云, 2018), 伴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等系列

纲领性和指导性文件的颁布, 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已基本形成。同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习近平, 2022), 这表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夯实农业农村基本现代化的基础将是“十四

* 项目来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部农业市场培育与开放研究”(编号: 71933005), 陕西省社科基金“陕西建立和完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研究”(编号: 2022F01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创新团队基金“村落空巢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问题研究”(编号: 2452022062)。刘天军为本文通讯作者

五”期间中国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度、广度和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这就要求充分借鉴脱贫攻坚期间形成的好经验和好做法,加快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格局,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定位,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乡村振兴中市场应该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应该更好发挥制度供给和市场监管作用,但要想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目标定位,还需要与社会实现动态匹配,方能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格局。

然而,在乡村振兴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一是政府权力“缺位”与“越位”并存。政府是推动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但在实践中基层政府因财政能力不足和资源整合能力有限而无法为乡村振兴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导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戈国莲等,2022)。同时,基层政府因资源限制、权责不匹配等因素牵制,无法准确区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而过度干预乡村振兴规划和乡村产业发展(吴晓燕等,2019),导致市场规则被破坏和农民参与不足。二是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与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农村人口流失严重与市场规则不健全,导致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和制度环境,对资源的配置效率较低(霍学喜等,2023);同时,受乡

土文化、乡土规则和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市场体系建设滞后和市场转型升级缓慢,导致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动能未被充分释放,产业兴旺仍面临现实挑战。三是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和内生能力不足并存。由于长期以来农村人口的单向流出,造成农村经济社会缺乏发展主体(李卓等,2021),进而导致部分村庄出现党组织软弱涣散,农民持续分化为小农户,留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难以形成有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王亚华等,2020),这已成为阻碍乡村振兴的一大障碍。乡村振兴的本质是有效解决乡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现实难题(秦中春,2020),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从而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基础。而破除以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动组织机制创新,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在促进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边界,找到政府、市场和社会实现有效匹配的内在机制,进而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政府机制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机制,但不是唯一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往往与其相互搭配共同发挥作用,市场机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社会机制则是重要的补充力量。鉴于此,本文将以陕西省袁家村为典型个案,深入剖析袁家村走向振兴过程中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融合共存的具体情境,以及三种机制互动协同促进乡村走向全面振兴的制度逻辑。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 促进乡村走向振兴的不同组织机制

中国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已形成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并存的局面,这表明多种力量在乡村中的融合共存和互为补充为促进乡村走向全面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文将对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促进乡村走向振兴的相关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1. 政府机制。城乡融合发展要求政府承担促进乡村发展的职责,国家干预和政府投入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途径,这已成为中国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改革的共识(郁建兴等,2009),早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国家对农业农村发展的调控和引导”,这一论述要求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平衡好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间的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动态平衡。政府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三农”事业发展,先后实施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实践中通过调整公共财政预算在“三农”领域的支出比例来为乡村振兴提供资金支持,这对促进乡村振兴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是通过重大制度安排和战略决策促进农业农村发展。这种方式具有深远影响,一般包括农村体制机制改革和乡村发展重大战略,前者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

革、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等基础性制度改革,后者包括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这是政府发挥其调控和引导职能的重要体现。三是通过制定具体的“三农”政策干预农业农村发展。1982—1986年,中共中央曾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进入新世纪以后,又连续二十年(2004—2023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颁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党和国家“三农”工作的重心,突显了党和政府对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政治责任(郁建兴等,2012),至2022年底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2. 市场机制。市场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侧重于强调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最优配置(黄祖辉等,202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率先在农村进行制度改革,确立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营体制,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李文钊等,2011)。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农村的逐步确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状况均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但在城市化改革启动后,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再次陷入停滞状态,大量资源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在市场竞争和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进而诱发了新的社会问题(杨雍哲,1994)。例如城乡差距扩大、农村经济活力降低、农村老龄化问题加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既与市场机制的缺陷有关,又与政府的“城乡二元”制度设计有关,资源从回报率不高的农业和农村流向回报率高的工业和城市(叶兴庆,2021),虽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但却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背离,因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政府要在合理发挥宏观调控和规则制定职能的基础上,对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进行干预,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以确保农业农村获得足够的资源投入,这既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石宝峰等,2021)。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背

景下,应该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快破除影响人才、土地、资金、技术和数字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的的制度障碍,聚焦构建城乡统一的大市场,加快营造符合市场化发展要求的制度环境,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撑。

3. 社会机制。社会机制是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之外,另一个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机制,是社会运行中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驱动和调节机制,重点在于发挥社会系统内各要素间的律动或惯性作用,通过增进信息对称、充当资源传输网络和鼓励先富带后富等途径,形成系统综合效应(严家明等,1994)。社会机制的运行遵循自身的规律,在促进乡村发展时,主要以熟人关系网、人情机制和面子观作为社会基础,并通过社会组织嵌入和乡村精英引领在村域经济范围内发挥作用。社会组织曾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时期,社会组织嵌入可以有效提高乡村发展韧性和满足农民需求,但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需要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进行,恰当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加快建构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李怀瑞等,2021),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齐文浩等,2023);另外,乡村精英也是社会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助推力量,乡村精英不仅具有权威性和公共性特征,还与乡村具有浓厚的情感联系,是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的内生主体,他们可以充分利用乡村文化网络,搭建村民参与乡村发展的渠道(刘生琰等,2020),从而调动更多主体服务于乡村发展。尽管乡村精英推动乡村发展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在实际运行中因缺乏针对乡村精英的约束机制,而导致乡村精英在推动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人治特征”,从而给村庄民主带来消极影响(吕蕾莉等,2017)。因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需要总结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加快构建社会组织 and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有效机制,进而激发社会组织促进乡村振兴的动能。

当前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如何促进乡村振兴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为本文提供了思想启发,但面对中国乡村振兴的复

杂现实,三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与作用情境及其促进乡村振兴所遵循的逻辑,都是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将聚焦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从互动的视角来看,多种机制在促进乡村振兴时是如何实现互动和协同的,以及三种机制在调动各方主体力量参与乡村振兴时的适用情境是什么;第二,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在促进乡村振兴时分别遵循何种制度逻辑以及制度逻辑间的关系是什么?本文将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建立理论框架,并以陕西省袁家村的实践作为典型案例,对以上两个问题进行解答。

(二) 制度逻辑理论视域下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制度逻辑是一套塑造组织场域内行动者认知及其行为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是一系列描述如何影响组织现实、行为与如何成功的准则(Feiedland等,1991;Thornton,2004;杨书燕等,2017),因而在理解组织或个体行为时,必须基于组织和个体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情境,不同的历史文化情境通常体现为不同的制度逻辑,组织和个体的行为虽受到制度环境的约束,但作为行动者的组织和个体也具有主观能动性,在具体的情境中会结合自身利益和战略目标阐释、演绎或选择制度逻辑(Mcpherson等,2013;Lee等,2015;Lee等,2017;徐凤增等,2021)。总体来看,在当今社会中共存的逻辑主要包括家庭、社区、国家、宗教、市场、职业和公司等,这些逻辑之间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却又共同对处于其中的组织和个体认知与行为产生影响(杨灵等,2022)。当前制度逻辑研究方面的文献主要基于西方社会情境,基于中国现实情境的研究比较少,仅有的一些文献也大多聚焦于商业组织或社会组织领域,为弥补研究不足,本文采用制度逻辑理论对乡村振兴微观实践中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协同共治的逻辑展开研究。

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是促进袁家村走向全面振兴的三种机制,这三种机制的起点和关注点均不相同,但在实践中这三种机制能够克服冲

突,共存于同一场域中,实现动态匹配。政府机制所关注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区域均衡发展,为政府出台政策干预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因而政府在干预农业农村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为市场和社会提供运行制度基础,同时,在补充和匡正市场失灵、社会失灵之外,还为培育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提供制度环境(郁建兴等,2009)。市场机制主要关注自我利益最大化,这为村庄发展注入了追求效率的理念,也为促进村庄资源高效利用提供了方向指引,但农业中的市场失灵和相对于工业的弱质性,需要政府出台相关制度规范和政策文件,建立起支持保护体系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社会机制是乡土社会的一种自我执行机制,这一机制以维护村庄社会秩序和村民互利共赢为出发点,是解决市场失灵或政府缺位问题的重要力量,农村社会组织的成长和社会力量的发育,不仅可以将政府从大量的社会服务中解放出来,还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的自我治理,因而在乡村振兴进程中需要引导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的成长。

在袁家村走向振兴的过程中,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是外生机制,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和村庄经济的发展而被逐渐引入,袁家村的发展实践表明政府的服务能力在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功能在逐渐强化,不同机制在促进乡村振兴时会提供不同的路径。而社会机制则是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执行机制,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乡绅治理,还是现代社会中的乡贤治理,乡土社会中约定俗成的治理规则一直存在,这是乡村内部的一种力量所在。袁家村的发展实践表明多种力量在促进乡村走向振兴时虽会遭遇冲突,但这种冲突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调和的,通过有效发挥不同机制的优势,并以其他两种机制作为补充,提高不同逻辑间的包容性,降低可能导致的排斥性风险,便能消解三种机制间的冲突,从而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序社会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见图1)。

三、案例选择与资料说明

(一) 案例选择

本文将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从多重逻辑视角讨

论促进乡村走向振兴的组织机制及其背后的逻辑。案例研究中的案例选择标准常常有别于定量研究

中的概率抽样原则,重点考虑的是案例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的匹配性(肖静华等,2021)。根据研究问题,本文在选择典型案例时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村庄发展的规律及成效应该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在全国范围内具备影响力,且在乡村振兴实践层面具有较强代表性。袁家村的发展实践为完整体现三大机制在村庄不同发展阶段的互动细节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支撑。第二,袁家村的发展变

迁过程正好经历了贫穷落后、解决温饱、村办企业、新农村建设、全面小康和全面振兴的历史阶段,从微观层面反映了国家农村发展战略的阶段性演化过程。由此,在对众多案例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袁家村既符合案例选择的两个原则,又与提出的研究问题具有高度契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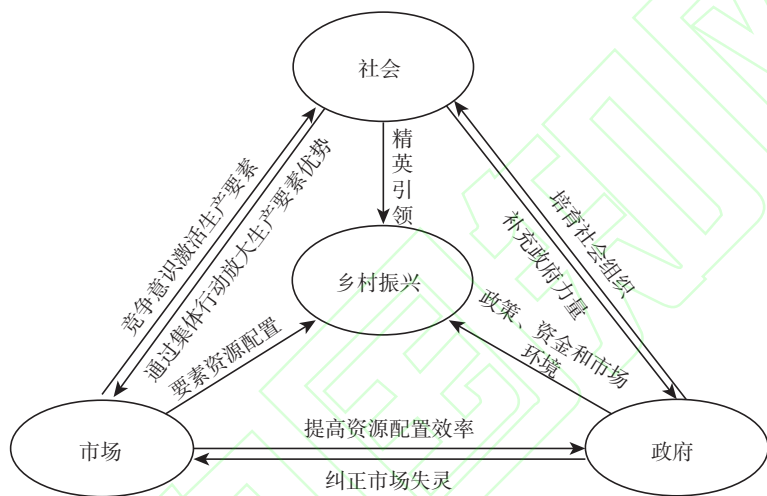


图1 制度逻辑理论视域下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袁家村地处关中平原腹地的礼泉县烟霞镇,历史上是一个贫困村,经历三个阶段的接续发展,现在已成为全国有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和乡村旅游目的地。20世纪70年代以前,袁家村主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但受制于地理环境恶劣,以及自然资源匮乏的制约,袁家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在当地是有名的贫困村;20世纪70年代开始,袁家村尝试农业学大寨(1970—1978年),村党支部积极动员村民发展农业生产,通过平整土地、造田积肥等形式不断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帮助村民解决吃饭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袁家村用活国家政策红利,尝试创办村办企业(1978—2000年),村两委带领村民利用九峻山石灰石藏量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建材工业,在村中建造白灰窑和砖瓦窑等,并以建材业为龙头,逐步建立起较为发达的村办工业体系,村集体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成

为当地的富裕村。然而,到2000年前后,国家出台关停“五小企业”的政策,受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袁家村的水泥厂、白灰窑厂等村办企业遭遇发展瓶颈,村办高污染企业被迫关停,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离开村庄外出谋生,袁家村逐渐变成“空心村”;直到2007年,袁家村村两委换届后,这种状态才得以扭转,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开始转变发展思路,以打造“关中印象体验地”为核心,探索发展乡村旅游业,在村党支部的带领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袁家村乡村旅游获得了较快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提高。2007年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初,袁家村原住村民仅有62户,286人,但经过十六年的发展,如今的袁家村已与周边九个村合并,形成了“袁家大社区”,汇集了1000余个创客,吸纳周边3000多人就业,年均接待游客600万人次,人均收入超过10万元^①,袁家村成为了全国有名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其发展经验为其他

① 数据来源: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

地方开展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二) 资料说明

本文的研究资料和数据是笔者及其研究团队分别于2019年9月、2021年10月和2022年5月三个时间段6次深入袁家村进行实地调查所得,在进行数据收集时,遵循三角验证的基本原则,采用多种方法收集数据资料,主要包括深度访谈、文件整理、档案查阅、实地调查和直接观察等方式,以便对资料和数据进行相互印证和相互补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分别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街区负责人和商户等不同对象进行面对面深度访谈,

每次均有3位以上调研员参与访谈,在访谈结束后征求受访者的意见对访谈内容进行补充完善。除此之外,研究团队还深入袁家村村史馆了解袁家村的发展历史,并收集关于袁家村的历史资料、新闻报道和视频资料等。新闻报道主要通过百度网页中检索关于袁家村的宣传报道和影音资料,学术资料主要通过中国知网检索获得,此外还通过微博、微信等渠道获得关于袁家村的相关资料。总体而言,研究团队通过分层次、分阶段和多渠道的方式搜集与本文相关的文本资料与统计数据。

表1 资料来源及基本信息说明

数据类型	收集时间	访谈对象	时任职务	访谈次数
一手资料	2019/2021	A1	村党支部书记	2
	2019/2022	A2	村委主任	2
	2019	B1	街区负责人	1
	2019	B2	街区负责人	1
	2019	B3	街区负责人	1
	2019	B4	街区负责人	1
	2019	B5	街区负责人	1
	2019	B6	街区负责人	1
	2019	C1	农家乐协会会长	1
	2019	D1	商户业主	1
	2019	D2	商户业主	1
	2019	D3	商户业主	1
	2019	D4	商户业主	1
	2019	D5	商户业主	1
	2019	D6	商户业主	1
	2019	D7	商户业主	1
	2019	D8	商户业主	1
	2019	D9	商户业主	1
	2019	D10	商户业主	1
	2019	D11	商户业主	1
	2019	D12	商户业主	1
	2019	D13	商户业主	1
	2019	D14	商户业主	1
二手资料	2019	E1	流动摊贩	1
	2019	E2	普通商户员工	1

文件资料、统计数据、宣传报道、档案资料等

四、案例分析:袁家村不同发展阶段的组织机制及其制度逻辑

袁家村历经三个发展阶段的变迁,已经实现了

从贫穷落后到乡村振兴的顺利转型,通过历程回顾

并结合不同阶段的主要业态,可以将袁家村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传统农业阶段、集体工业阶段和乡村旅游业阶段。本文结合袁家村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情景下的实践,对袁家村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组织机制及其背后所遵循的制度逻辑进行解释。

(一)袁家村从贫穷走向振兴的发展阶段

1. 传统农业发展阶段:乡村社会精英引领袁家村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全面干预导致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比较弱小,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袁家村在此阶段属于关中地区典型的农业生产型村庄,亦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彼时的袁家村村治体系尚未建立,村庄治理主要受到血缘宗族关系影响,宗族之间的斗争导致村内派系林立(黄鑫等,2020),面临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和村庄治理失序的双重困境,集中表现为粮食产量低和村庄公共事务管理混乱。正如A1谈到:“袁家村曾经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耕地面积不足400亩,人均不到1亩,且大多分布在弯曲不平的古河道上,是‘跑水、跑土、跑肥’的贫瘠地,极不利于农业生产。另外,袁家村过去还是宗族问题比较严重的村,在郭、袁、王三大家族的相互斗争下,村中人心涣散,村务情况混乱”^①。

然而,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场力量的介入有限,才为乡村社会自主发展创造了空间,20世纪70年代,袁家村的乡村政治精英意识到有责任引领村民脱贫致富,于是带领村民开始进行农田改造,发展粮食生产。A1谈到:“当时我的父亲就觉得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绝对不能辜负村民的信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带领村民发展农业生产,并将解决吃饭问题作为首要任务。袁家村能有今天的富裕生活离不开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②。乡村精英的一系列行动充分激发了村民主观能动性和农业生产积极性,

村民很快摆脱了“食不果腹”的局面。正如一位流动摊贩谈到:“袁家村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村干部比较进取,不断寻求突破,再加上宣传得当,袁家村的名声不断壮大”^③。袁家村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的粮食增产和农业资本积累,不仅直接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还为村庄集体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

2. 集体工业发展阶段:政府产业政策对袁家村发展的双重规制。第一,政策变革支持工业经济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虽为发展集体经济提供了制度支持,但却因市场和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为乡村组织获取要素、组织交易和规避风险提供了环境(谭秋成,2003),袁家村正是抓住了这一发展环境,充分利用石灰石储量丰富的优势发展建材工业,逐步建立起村办工业体系,并分别于1983年和1986年扩大村办企业发展规模,到1990年建材工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正如A1所言:“改革开放后,袁家村充分利用政策红利,率先发展村集体工业,在全体村民的努力下,村庄集体工业经济发展得很好,袁家村实现了村庄集体经济的第一次转型”^④。同时,1988年袁家村成立了“农工商公司”,制定了“内引外联,借船出海,创办扩建,滚动发展”的战略,村办集体工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约束工业经济发展。1990年以来,袁家村在前期发展的基础上,又先后投资建成硅铁厂、印刷厂等一批小型企业。同时,伴随建材业的发展,村里成立了汽车运输队和建筑队,开办商业服务部,使工、商、建、运、服各行业得到全面发展,全村90%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和第三产业,工农业产值比重发生重大变化,农业仅占总产值的0.5%,工商业则占99.5%^⑤。但2000年以后,伴随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调整,国家要求逐步关停“五小企业”^{*}等高污染企业,以建材、硅铁厂为主的村办企业遭遇发展瓶颈期,集体工业发展效

① 访谈编号:A1-20190719

② 访谈编号:A1-20190720

③ 访谈编号:E1-20190723

④ 访谈编号:A1-20190719

⑤ 数据来源:除特殊说明外,此处及后文数据均为调研所得

* “五小企业”是指浪费资源、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小煤矿、小炼油、小水泥、小玻璃、小火电等企业

益开始下降,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外出谋生。正如A1谈到:“村庄集体工业因环保政策而关停,导致村民收入水平受到影响,但村民还要吃饭啊,为补贴家用,村民开始外出务工,以提高家庭收入”^①。

第三,政策规制下的村庄发展再转型。由于国家产业结构和产业的调整,袁家村集体工业发展陷入瓶颈,但袁家村领导班子成员却及时转变发展思路,结合国家宏观政策方向和袁家村发展实际,带领村民进行二次创业,于2006年提出了“休闲文化兴业、旅游富民增收”的发展思路,通过大力挖掘农耕民俗文化,将发展旅游业作为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从而破解村庄发展瓶颈,实现了村庄集体经济发展的再转型。一位村民谈到:“袁家村的发展主要是村中领导头带得好,虽然也与国家政策有关,但更多的是村中领导和村民齐心,才发展得这么好”^②。这表明在国家政策的规制下,乡村精英仍然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促进村庄实现转型。

3. 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市场对资源的高效配置促进袁家村快速发展。第一,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的市场营造。袁家村于2007年7月全面启动“关中印象体验地”发展规划,但在发展初期,乡村旅游并未得到村民的支持。例如A1谈到:“因为初步接触这一新兴行业,村民对此都不了解,多数村民都不愿意参与,村委会只能鼓励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带头示范,开起了最初的农家乐。最初只有5户人家经营农家乐,做得好的只有2~3家”^③。但袁家村的领导班子善于解决问题,以社会资本为纽带突破了资源约束和条件限制,通过“无中生有”的形式进行旅游文化发明,充分利用关中农耕文化资源营造乡村旅游初级市场,例如,改造古朴村寨和传统作坊、挖掘本地农耕文化等,以此不断丰富乡村旅游元素,促进市场共同体的发育。同时,开启对关中古建筑的复兴计划,对水泥街道进行改造,复原旧式的石板街道,将全村的商户改造

成关中传统的合院式建筑,并改造土地庙和祠堂,突出传统关中农村风情(郭占锋等,2021)。

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袁家村主要围绕农家乐和作坊街进行建设,将景区建设与村庄建设融为一体,并通过组织动员更多村民参与旅游市场建设,从而在村域集体经济范围内营造旅游市场。在乡村旅游市场发育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袁家村领导班子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例如A2谈到:“为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农家乐建设,村委会设置了相关的政策激励村民,比如装修农家乐,村委会补贴一半的钱,一般都是1万~3万元左右,劝说村民的时候都是说‘装修好了房子,不仅能够经营赚钱,就算赚不了钱,装修好的房子也是给自家人住,况且村委会还给补贴,这个买卖不亏’”^④。同时,政府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一位商户谈到:“袁家村旅游业前期发展主要靠政府支持,才顺利度过两年过渡期,其他地方因为没有政府支持,很难安全度过两年过渡期,过渡期之后商户会大面积撤离,等到同类村落意识到转型的时候商户已经撤离大半,转型已经来不及”^⑤。可见,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政府与社会的协同促进了袁家村乡村旅游市场的不断完善。

第二,乡村旅游发展成长期的市场驱动。经过前期的乡村旅游市场营造,袁家村的乡村旅游已经初见成效,历经两年时间建设,袁家村于2009年建成了小吃街,开业时小吃街的经营商户已达66家,逐渐成为袁家村吸引游客的支柱产业。正如D9所言:“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袁家村的客流量逐步增大,为满足游客需求,我在年初投资130多万元翻修了住房,把住宿由一开始的两间房改造成现在的12个客房,其中包括7个关中特有的炕炕和5个标间,并且每个房间都有卫生间、洗浴、空调、电脑等,住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满足了旅客基本的住宿标准”^⑥。到了2011年,袁家村响应“旅游兴县”“建设大唐旅游文化名县”的政策号召,为满足

① 访谈编号:A1-20190720

② 访谈编号:E2-20190724

③ 访谈编号:A1-20210501

④ 访谈编号:A2-20190725

⑤ 访谈编号:D7-20190718

⑥ 访谈编号:D9-20190726

游客的夜间娱乐活动,建成酒吧一条街。2013年,袁家村被市县确定为城乡统筹发展试点村,与周边九个村合并组建袁家大社区。同时,确定了“一村带九村”的发展思路,逐步形成了集原生态农业观光、关中农耕文化体验、农家休闲度假、康体娱乐和生态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休闲旅游示范区,袁家村逐步完成了以第三产业带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的转型,袁家村通过旅游市场需求驱动,将乡村旅游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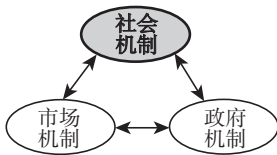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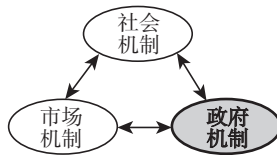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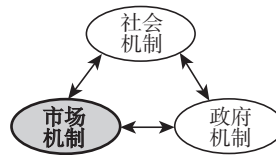
第三,乡村旅游发展成熟期的市场主导。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和积累,袁家村在2015年进入快速发展期,先后建成回民街、清真寺、祠堂街和书院街,旅游地域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旅游元素不断丰富。截至2022年底,袁家村共有工艺品店26家、股份合作社14家、酒吧茶馆17家、客栈酒店11家、康庄老街特色小吃82家、祠堂街小吃39家、回民街小吃46家和其他店铺3家,已基本形成农家乐、作坊街、小吃街、祠堂东街、酒吧街、回民街、书院街和酒店住宿八大产业集群。正如A1所言:

“随着袁家村发展越来越好,许多外来资本想要进驻袁家村,这些外来资本几乎都是主动接触袁家村,他们自行负责各自街道的具体工作,但需要遵守村委会的统一规定”^①。与此同时,袁家村先后成立了14家股份制合作社和8家“前店后厂”的实体子公司,这表明在乡村旅游市场成熟后,市场逐渐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袁家村不同发展阶段的主导组织机制

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是促进袁家村不断发展壮大的三大机制,这三种机制在实践中能够克服冲突,共存于同一场域中。实践表明袁家村的发展虽受到周围环境的约束,但在面对村庄发展困境时,村领导班子总能依据不同的发展情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具体情境中结合宏观社会背景、自身利益和战略目标,选取不同的组织机制来破解村庄发展困境,从而促进村庄不断实现转型。总体而言,袁家村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着“发展困境—相机决策—主导机制”的基本逻辑来促进村庄实现转型(见表2)。

表2 袁家村不同发展阶段的主导机制及适用情境

情境/机制	传统农业发展阶段	集体工业发展阶段	乡村旅游业发展阶段
发展困境	贫穷落后	集体经济衰落,人口不断外流	旅游资源匮乏,招商引资困难,经营能力较弱,恶性竞争严重
应对策略	发展农业生产,解决温饱问题	重振集体经济,吸引人才回流	发展乡村旅游,严格规范招商,提升经营能力,治理恶性竞争
发展情境	政府和市场对乡村发展干预较少	市场和社会对促进乡村发展作用有限	政府和社会无法实现对资源的高效配置
主导机制	社会机制	政府机制	市场机制
核心机制及其相互关系			
发展成效	农业生产水平提升,温饱问题解决	村庄集体经济实现成功转型	乡村旅游业成为带领村民致富的主导产业

注:加粗字体与加粗圆圈为该阶段主导机制

第一,传统农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导。社会机制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约束和执行机制,这种机制在社会运行过程中一直存在,其作用与功能的发挥与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强度有关。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袁家村面临的主

要发展困境是贫穷落后,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条件差、村民思想观念保守和村内宗族斗争激烈等。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和政府机制干预不足的情境下,袁家村主要负责人面对如此困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承担起了引领袁家村发展的社会责任。因

① 访谈编号:A1-20210502

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村党支部书记为代表的乡村精英开始盘活村内可以利用的资源,并组织动员村民发展农业生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村民的温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社会机制在这一发展阶段占据相对主导地位,其原因在于三大机制间的包容性和互动性,正是因为市场机制发育滞后和政府机制干预不足,才为社会机制在村庄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第二,集体工业发展阶段的政府主导。政府机制是国家或政府运用国家权力系统来确立和推广国家主流价值观,制定相关制度和规则,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和调节的一种方式。在集体工业发展阶段,袁家村面临的发展困境主要是村庄工业衰落、集体经济萎缩和村庄人才外流。在市场机制发育不足和政府机制过度干预的情境下,受制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变化,高耗能和高污染的村办工业陷入发展困局。在此压力之下,袁家村领导班子再次思考村庄转型的方向,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寻找其他替代产业,一致认为应结合国家宏观政策调整的方向,规划村庄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争取获得政府政策支持。在这一阶段,袁家村的发展主要受到政府政策的双重影响,既受制于政府政策的规制,又得益于政府环保政策的支持,进而逐渐形成了政府机制主导发展的情境。

第三,乡村旅游发展阶段的市场主导。市场机制是资源在市场上通过自由竞争与自由交换来实现配置的机制,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组织机制之一。在乡村旅游发展阶段,袁家村面临的发展困境主要包括旅游资源匮乏、招商引资难、经营能力弱、恶性竞争和邻里关系危机等,在此阶段袁家村虽找到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新思路,但却受限于旅游资源限制,并不具备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禀赋。面对这样的发展困境,袁家村领导班子结合国家宏观政策环境和旅游市场调研,不断创新发展思路,以“无中生有”的方式进行乡村旅游文化发明和景观改造。同时,通过集体行动组织动员村民加入旅游初级市场营造,采取精英带动、关系扩展和制度吸纳三种途径不断拓展乡村旅游市场,进而助推袁家村乡村旅游走上市场主导的发展轨道。在此发展阶段,市场对旅游资源配置发挥了关键作用,村庄由此进入高效发展阶段,逐步实现以市场

机制为主导。

(三) 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协同共治

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在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分别遵循着不同的制度逻辑,三种逻辑的关注点虽有差异,但在实践中能够克服冲突,共存于同一场域中,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促进袁家村实现不断发展(见表3)。

1. 政府逻辑以国家制度与政策为规范基础,重点关注城乡均衡发展和村庄基本公共服务改善。在袁家村发展过程中,政府逻辑主要体现为约束与支持的双重作用,当村庄的发展理念与国家宏观发展理念相悖时,村庄发展便受到宏观政策的约束,例如2000年前后国家出台关停“五小企业”政策直接导致袁家村一批高污染和高耗能企业被淘汰,村庄经济效益下降,从而倒逼袁家村进行转型。而当村庄发展方向或乡村业态符合国家主导发展理念时,村庄便受益于政府政策支持,例如21世纪初国家鼓励发展环保产业,袁家村便结合国家政策及时转变发展思路,于2007年在村党支部书记的带领下启动“关中印象体验地”发展计划,从而将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动村庄转型的突破口。同时,政府逻辑还体现在公共财政的分配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阶段,袁家村在国家财政专项资金的投入下,村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极大地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社会治理水平和村庄发展基础。此外,政府逻辑还体现在村民的民主参与实践中,规范的管理程序和规章制度在规范村民行为的同时,保证了村庄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而确保村民共同参与村庄市场建设和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促进村民共享村庄发展成果。

2. 市场逻辑以绝对收益为规范基础,理性经济人是其基本假设,公平交易和价格机制是其基本规则,重点关注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逻辑在集体工业阶段开始发挥作用,在乡村旅游阶段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村民竞争意识的增强和外来资本的引入。市场逻辑进入村庄后,与村内独有的乡土逻辑发生冲突,打破了村庄原有的社会秩序,如商铺之间的同质竞争,诱发了邻里间的关系危机,既不利于村庄产业发展,也不利于社会和谐。

袁家村为规避市场逻辑主导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无序竞争诱发的矛盾没有集中爆发之前引入股份制,妥善处理了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的矛盾,从而确保村庄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另外,在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后,市场逻辑开始发挥主导作用,袁家村在了解旅游市场发展方向和景区游客体验需求的基础上,采取竞争上岗的形式,面向全球启动“实习村长”计划,以项目孵化的形式帮助袁家村寻找最佳经理人和最适合的产业项目,这些发展实践为补齐袁家村的发展短板储备了人力资源。市场逻辑主导虽诱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但袁家村通过生产要素联合与资源配置的逆市场化操作、经营收益与经营风险套嵌式分配,有效地解决了市场失灵和村庄失序的问题,促进农户个体与村庄集体共同发展。

3. 社会逻辑以社会规则为规范基础,以社会文化网络与社会关系网络为纽带,以维护村庄集体利益为目的,在袁家村走向全面振兴的各个阶段均发挥着作用。在袁家村早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村庄精英*均发挥了关键引领作用,他们基于社会文化网络和个人声望等社会规范,利用熟人关系和

个人权威组织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建设,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动员村民发展粮食生产,在集体工业发展阶段动员村民参与工业生产,在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动员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和旅游市场建设。可见,乡村精英在村庄起步和发展转型的关键环节,可通过社会文化网络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村庄不断实现转型。同时,村民在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遵循着乡土社会规则来共同治理村庄,并在共建共治的基础上共享村庄发展成果。另外,袁家村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延续着“共富不暴富”的村庄传统,注重全体村民的共同发展,无论是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和集体工业发展阶段,还是乡村旅游发展阶段,袁家村均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对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例如一个商户的营业额超过20万元,且达到了60万元,就会抽取其收益的80%用来补足另一个营业额不足20万元的商户,这种资源分配的逆市场化操作,避免了因经营能力和持股数额过于悬殊而引发的两极分化问题,以此保证全体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表3 政府、市场和社会机制背后的三重逻辑

项目	政府逻辑	市场逻辑	社会逻辑
隐含假设	再分配机制	公平交易	社会责任
合法性来源	公共财政分配,民主参与	价格机制	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网络
权威来源	官僚程序	股东行为	社会地位
认同来源	社会经济阶层	无声的经济强制	社会文化基础
战略基础	增加公共利益	增加利润	维护群体利益
非正式控制机制	幕后政治	行业分析	人情,关系,面子
规范基础	国家规范	自身利益	社会规则
关注基础	区域发展,公共服务	市场地位	群体福利

注:此处关于逻辑维度的划分参考徐凤增等(2021)的划分方法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通过对袁家村发展实践的深入分析,本文探究了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协同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情境与逻辑基础,并对三大机制在袁家村发展实践中的互动、冲突与匹配过程进行了研究,进而提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协同促进

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总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在促进乡村振兴时既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这三种机制分别在不同发展阶段发挥主导作用,且机制之间的动态匹配共同促进了乡村振兴。政府机制在村庄

* 此处主要指的是集村庄政治精英和村庄经济精英为一体的村党支部书记

集体工业阶段发挥着主导作用,通过制度和政策发挥着支持与制衡的双重作用,市场机制在传统农业阶段和集体工业阶段发挥着有限的资源配置作用,但在乡村旅游市场成熟后,市场逐渐发挥主导调节作用,而社会机制一直存在于袁家村发展的各个阶段,持续发挥催化与粘合作用,但任何一种机制要更好发挥作用,均需与其他两种机制在同一场域中实现匹配。

第二,村庄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境和村级组织的能动性共同决定了村庄发展逻辑的选择,而这种发展逻辑必须与发展困境、发展阶段和发展情景相匹配才能有效促进村庄发展。袁家村每一个发展阶段面临的困境均有差异,村级领导者基于发展困境和发展情境的动态变化,在不同发展阶段相机选择不同的发展逻辑,进而形成不同的主导机制,但这些机制之间是一种动态互补关系。另外,差异化的发展逻辑虽可为乡村振兴提供不同的发展资源和行动指南,但政府逻辑、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要协同推动乡村振兴,还必须提高各种逻辑间的相互包容性与利益相融性。

(二) 政策建议

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协同促进乡村走向振兴,但这三种机制背后的制度逻辑有所差异,在实践中必须实现动态匹配才能更好发挥各种机制的作用。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应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村庄发展阶段等具体情境,选择不同的主导发展逻辑,并提升不同逻辑间的包容性,才能促进乡村走向全面振兴。具体而言,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政府机制在促进乡村振兴时,应该充分发挥其调控与引导作用,为乡村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和制度保障。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共组织,其公共服务职能决定了政府在促进乡村振兴上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政府应该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继续加大投入,破除影响城乡居民公平获得公共服务的制度障碍,加快补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同时,充分发挥宏观政策引导与约束功能,在匡正市场失灵和规范社会力量基础上,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并为其创造政策环境。

第二,市场机制在促进乡村振兴时,应着重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发展要素在城乡间顺畅流动和高效利用。解决乡村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是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市场机制的引入可以提高乡村各要素的利用效率,激活乡村发展的活力,因而在乡村振兴实践中需要结合各个村庄的资源禀赋与发展环境,适时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并构建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以此激活村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实现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双赢,进而提高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三,社会机制在促进乡村振兴时,应以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缺位为落脚点,重点在于发挥自我执行机制促进乡村社会的自主治理和自主发展。乡村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运作规则和治理规律,这一机制是对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重要补充,在促进乡村振兴时要注意识别。当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村民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借助社会机制来调和他们之间的冲突,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实现自主管理和自主发展,这就要求在实践中要注意培育社会组织,并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提供平台和空间。

参考文献

1. Feiedland, R., Alford, R. R. Bringing Society Back in: Symbols,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s//Powell W. W. and DiMaggio P. J.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 Lee, B. H., Hiatt, S. R., Lounsbury, M. Market Mediators and the Trade-offs of Legitimacy-Seeking Behaviors in a Nascent Category.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7(3): 447-470
3. Lee, Min-Dong, Paul, et al. Filtering Institutional Logics: Community Logic Variation and Differential Responses to the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of Toxic Waste. Organization Science, 2015(3): 847-866
4. Mepheron, C. M., Sauder, M. Logics in Action: Managing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in a Drug Cour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13(2): 165-196
5. Thornton, P. H. Markets from Culture: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i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戈国莲,刘 磊. 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测算与建设研究. 农业经济问题,2022(10):133~144
7. 郭占锋,张 森,黄民杰. 旅游文化发明与乡村市场体系重构——对一个关中村庄的社会学剖析. 社会学评论,2021(6):233~252
8. 韩 俊. 以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为根本遵循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管理世界,2018(8):1~10
9. 黄 鑫,邹统钎,储德平. 旅游乡村治理演变机理及模式研究——陕西袁家村 1949—2019 年纵向案例研究. 人文地理,2020(3):93~103
10. 黄祖辉,李懿芸,马彦丽. 论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与作用. 农业经济问题,2021(10):4~10
11. 霍学喜,刘天军. 西部地区乡村振兴实施的理论逻辑与发展路径. 农业经济问题,2023(1):29~37
12. 姜长云. 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 管理世界,2018(4):17~24
13. 李怀瑞,邓国胜. 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四个个案的比较. 中国行政管理,2021(5):15~22
14. 李文钊,谭沂丹,毛寿龙. 中国农村与发展的制度分析: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管理世界,2011(10):32~47+187~188
15. 李 卓,张 森,李轶星,郭占锋. “乐业”与“安居”:乡村人才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陕西省元村的个案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56~68
16. 刘生琰,梁 哲. 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与路径研究.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127~137
17. 吕蕾莉,刘书明. 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 政治学研究,2017(3):104~113+128
18. 齐文浩,齐秀琳.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机制、障碍与因应策略. 农业经济问题,2023(3):62~71
19. 秦中春.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管理世界,2020(2):1~6+16+213
20. 石宝峰,赵敏娟,夏显力,罗必良.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第四届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综述. 经济研究,2021(5):203~207
21. 谭秋成. 转型时期乡村组织行为与乡镇企业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2003(2):72~83+205~206
22. 王露璐.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2021(12):89~109+201
23. 王亚华,臧良震. 小农户的集体行动逻辑. 农业经济问题,2020(1):59~67
24. 吴晓燕,赵普兵. 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 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21~128
25.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人民日报,2022-10-26
26. 肖静华,吴小龙,谢 康,吴 瑶. 信息技术驱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美的智能制造跨越式战略变革纵向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2021(3):161~179+11+225
27. 徐风增,裘 威,徐月华. 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治理机制及其作用——一项双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2021(12):134~151+196+152
28. 严家明,于 真,杜云波等. 社会机制论. 知识出版社,1995
29. 杨 灵,王晓瑜,陈 劲. 基于制度逻辑理论视角的创业理论文献综述. 管理评论,2022(7):95~104
30. 杨书燕,吴小节,汪秀琼. 制度逻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管理评论,2017(3):90~109
31. 杨雍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农村发展. 管理世界,1994(1):35~42
32. 叶兴庆. 迈向 2035 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策略. 管理世界,2021(4):98~112
33. 郁建兴,高 翔. 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2012(5):95~112+206~207
34. 郁建兴,高 翔. 农业农村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一个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2009(6):89~103+206~207

Multi-organization Mechanism and Its Institutional Logic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Yuanjia Village in Shaanxi Province

LI Zhuo, LIU Tianjun, GUO Zhanfeng, HUO Xuexi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the coordinated promotion of government mechanisms, market mechanisms, and social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o-

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organizing, mobilizing, and excavating village development resourc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Yuanjia Village from a poverty-stricken village to a prosperous village, revealing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vealing the action logic behind it based on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1) government mechanisms play a leading role in the collective industrial stage of villages, playing a dual role of support and balance through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Market mechanisms play a limited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nd collective industrial stages, while in the rural tourism stage, the market gradually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while social mechanisms exist in various stages of Yuanjia Village's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exerting catalytic and adhesive effects,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other two mechanisms,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2) In the process of Yuanjia Village's revitaliz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scenarios faced at different stages, the development logic adopted varies. Government logic, market logic, and social logic play a leading role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but no matter which logic plays a leading role, it needs to achieve dynamic matching with the other two development logics.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Collaborative promotion; Rural reform; Internal logic

责任编辑:李 雪